



〈故 舊 篇〉

## 我與圖書館結了不解緣

蘇 瑩 輝

民國 43 年張曉峯先生入長教育部後，除先設置國立政治大學研究部外，並恢復國立中央圖書館建制，請蔣慰堂先生重任館長；將臺中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內之中圖組劃出獨立，在臺北市籌劃建館，先於中山南路教育部旁臺大醫學院大禮堂辦公，而館藏善本圖書仍留存霧峯鄉之北溝書庫，並聘昌瑞卿先生為特藏組主任，顧樹齋先生為採訪組主任，任蒞女士為編目組主任。除昌兄在臺中留守珍本(含歷代善本及金石拓片)館藏外，我和顧、任二主任皆先後調臺北南海路新館，其時我的職稱是簡聘編纂(隸特藏組)，但一度兼秘書工作，直至 55 年(1966 年)冬初應聘往吉隆坡馬來亞大學漢學系任教時止。我離館(留職停薪)時的中央圖書館(以下簡稱中圖)館長已是屈翼鵬先生，因為蔣館長已轉任故宮博物院院長。

以上是簡述我和中圖同仁押運館藏善本書及金石拓片抵臺後的情形。下面則縷敘在渝入館、勝利還都、京滬間接收工作以及提運珍本等任務。

民國 29 年冬，我由上海負笈往滇西，在洱海之濱的才村，待了一年多時間，經立齋張先生之介，於 31 年 4 月初，到戰時陪都——重慶，持函拜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蔣慰堂先生(復璁)，他隨即手諭人事室，分發我去重慶上游白沙鎮(隸江津縣)的中央圖書館總館特藏組工作。組主任屈翼鵬先生分配我的任務是編訂館藏金石拓本目錄，也許他因為我家中曾藏有部分的金石拓本和極少數之古物小品(如泉幣、漢瓦當、古璽印等)，庶幾我能夠勝任愉快吧！在不足一年的期間，我從屈先生學到若干金石學和考古學方面的知識。為時不久，蔣館長就調派我往重慶分館工作，時適教育部假本館底層各閱覽室為第三屆全國美展會場，大會第二組主任常書鴻先生要我擔任收件和還件工作，而保管室則在二、三樓，上上下下，苦不堪言，然而因此認識了不少藝術作家(包括雕塑、書法

及中、西畫家)；想不到的還有奇遇，便是大會將結束時，常先生忽奉部聘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處主任，他竟約我同往西北，且經蔣館長核准借用一年，後來我與敦煌的結緣，實即發軔於此。

在敦煌莫高窟(俗稱千佛洞)下工作繁忙，一年的光陰如白駒過隙，當我離敦經蘭州返渝時，國立西北圖書館劉館長衡如堅留在館任編纂，他竟致函蔣慰老請予借調八個月，劉、蔣係老友，又皆圖書館學界老前輩，慰老遂同意照借，於是我得多留西北數月，搜集了不少資料，來臺後出版的《敦煌學概要》和《敦煌論集》二冊，多半是依據這些資料寫成的。言念及此，飲水思源，怎能不感謝慰老的栽培呢？

我留蘭州八個月後南旋時，行經古秦州——天水，忽聞爆竹聲不已，原來是日軍投降了！回渝館任職未久，即偕中圖第一批人員，出峽經武漢順流而下，還都復員。旋因共軍迫近蚌埠，遂於 37 年尾奉派與中圖特藏、編目兩組同仁押運第二批善本圖書來臺，以策安全。翌年二月，慰老自京乘輪抵臺灣，視察中圖善本圖書運儲情形，迨第三批普通圖書運達臺中後，他即轉往廣州，時中央政府已遷穗，本擬籌設中圖辦事處，卒因礙於政府法令而作罷。同年四月，他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(UNESCO)之邀請，赴歐洲研究圖書館事業，先後考察法、英、丹麥、西德、瑞士等國圖書館，歷時半載，並奉教育部令派任我國代表，出席巴黎第五屆聯教組織會議。十月，中央政府遷臺。教育部爰在臺中設置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，將故宮博物院、中央博物院籌備處、中央圖書館及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四機構運臺之圖書文物、器材與隨行押運員工合併納入。是月，慰老自法京東裝返國，時廣州已淪陷，而中圖亦已裁併，他遂暫止香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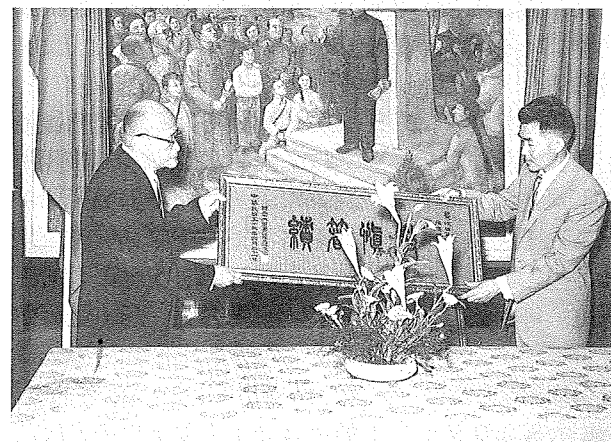
43 年(1954 年)8 月，慰老奉教育部令籌備恢復國立中央圖書館。9 月，中圖奉令恢復建制，准其復

館長原職，並接收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管處「中圖組」所保管之圖書檔案。10 月，設國立中央圖書館辦事處於教育部內，正式辦公，展開各項工作，執行出版法以徵集全國出版之書刊，及恢復停頓已達六年的出版品國際交換業務。是月，慰老受聘為行政院所轄之國立故宮、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理事。翌年 9 月，商得臺灣省教育廳同意，撥借臺北市南海路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之宿舍，以充中圖館址，中圖同人始由教育部遷入辦公。直至 47 年 7 月，中圖才正式列入國家政府預算。

49 年 5 月，中圖興建門廳大樓落成，並在善本閱覽室後附設藏書庫，飭由特藏組主任自臺北北溝書庫選提善本複本書一萬六千餘冊，運存臺北，以便利讀者來館取閱。

54 年(1965 年)8 月 21 日，行政院召開首次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，通過在臺北士林之外雙溪恢復設置國立故宮博物院，9 月，聘蔣慰老為在臺首任院長，任期二年，遂於 20 日接篆就任，辦理前兩院一館聯管處之結束與接收事宜，並仍暫兼中圖館長職務；直至屈翼鵬先生接長館務時止。至於勝利還都不久，我奉派往來京、滬間的提運珍本情形，亦併述如次：

勝利還都時，蔣慰老奉派為京滬區(含蘇、浙、皖三省)特派員，主持區內接收事宜，關於戰前及抗戰期間託友在滬搜購之珍善本圖書，則集中於徐森玉、鄭西諦二先生處，慰老因我與兩老為舊相識，遂三次令派我搭乘京滬線特快車(往返皆坐頭等車廂)往返上海、南京間，從事善本古籍之洽取、押運等工作。本屬圖書資訊人員分內之事，不足驚奇，惟在滬時並非只向徐、鄭二老直接取書而已，有時往往須分別向



蔣館長以「勤慎著績」匾額頒贈作者蘇瑩輝先生(右)



蔣復璁老館長華誕日與圖書館學界人士合影，左四為作者

售主(包括藏家和古董商)住處跑上二、三次(有時他們外出，有時要等待他們和徐、鄭二老電話洽談書款……等問題)，有時且須等待他們(書商)向真正藏書者手中將書取得；似此情形最麻煩，有時原訂某月某日到滬取書(不止一家)的對象共有三家，而其中一家因書款未付清，不能交貨(買方為鄭或徐氏)，只有下一次到滬時再來領取。然後還要洽訂返京車票，常有館中同仁問道：「蘇某每次往返上海、南京間，為什麼皆要坐頭等車廂呢？」其實並非我要享受頭等車廂的座位，而是善本珍籍要坐，蘇某只不過是它們的監護者(或保鑣)而已！事實上我那裡有保鑣的資格？也只因頭等車廂空位較多，而乘客較少(也較寧靜)，自以為略具安全感而已。相反的，我的責任感更大，戒慎恐懼感也隨之增高！中圖既未替我買保險，也沒有供給自衛武器，我常自忖度，欣慰的是館方對我的信任，恐懼的是責任太大，所幸這些現今皆成歷史名詞了！套一句成語說：「那堪回首憶從前！」也還恰當。

回憶近四十年前，奉派押運中圖圖書(以善本書為主)來臺的同人(如顧樹齋、任蒞、昌瑞卿、王省吾、儲連甲等)，有已亡故(如顧、儲二位)者，有出國者(王氏赴澳、任女士赴美)，目前在臺者，除筆者外，尚有歷史、版本學家故宮副院長昌瑞卿先生一人。工友中惟呂起森一人(現仍留館以臨時技工名義，擔任善本書之維護、修補工作，頗具績效)，尚在中圖服務。併識於此。

• 蘇瑩輝先生，曾任本館編纂，現已自國立故宮博物院退休。